

张忠良 刘仲良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FAZHAN LILUN
YANJIU

毛泽东邓小平 发展理论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 发展理论研究

张忠良 刘仲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章红立

装帧设计:贺旭

毛泽东邓小平发展理论研究

张忠良 刘仲良 李金龙 著
刘玉珂 吴建芳 李高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78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92,000

ISBN7-5438-2032-3
D·252 定价:17.50元

第一章	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1)
第一节	发展与当代发展理论	(1)
第二节	当代中国主要问题是发展	(8)
第三节	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15)
第二章	发展道路论之比较	(28)
第一节	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鉴”	(28)
第二节	从“以苏为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46)
第三章	发展动力论之比较	(66)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论	(66)
第二节	“继续革命”论与“第二次革命”论	(82)
第三节	毛泽东邓小平发展动力观的继承、发展关系	(91)
第四章	发展任务论之比较	(98)
第一节	“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论	(98)
第二节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经济建设中心论	(107)
第三节	发展速度与效益论	(113)

目 录

第五章	发展模式论之比较	(124)
第一节	政治模式：从民主群众化到民主法制化	(124)
第二节	经济模式：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137)
第三节	意识形态模式：从“双百方针”与“六和标准”辨 证统一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46)
第四节	祖国统一模式：从“和平解放台湾”到“一 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157)
第六章	发展战略论之比较	(168)
第一节	从“二阶段”论到“初级阶段”论	(168)
第二节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178)
第三节	从理顺“十大关系”到正确处理“十二大关系”	(185)
第七章	发展条件论之比较	(196)
第一节	安定团结与保持稳定	(196)
第二节	“只争朝夕”与“抓住时机上台阶”	(215)
第三节	“一边倒”与全方位开放	(225)
第八章	发展关键论之比较	(239)
第一节	发展“关键在干部”与“关键在人才”	(239)

目 录

第二节	“打好科学技术一仗”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51)
第三节	毛泽东、邓小平发展关键论特色辨析	(263)
第九章	发展保障论之比较	(267)
第一节	政治保障：贯彻“六条标准”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67)
第二节	法制保障：“按法律办事”与“两手抓”	(278)
第三节	人权保障：尊重人民“同等的人权”与维护“国权”保障“人权”	(288)
第十章	发展样式论之比较	(306)
第一节	毛泽东的发展波浪式与齐富共富式	(306)
第二节	邓小平的发展跳跃式与先富共富式	(315)
第十一章	发展趋势论之比较	(327)
第一节	“东风压倒西风”论	(32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必胜论	(347)
第十二章	结 论	(365)
后记		(372)

第一章 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消除匮乏，消灭贫困，走向发展，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种发展理论竞相提出，各种发展模式先后问世，一时蔚为壮观。置身于当代发展大潮中的中国，以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引人注目。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有必要对当今世界发展理论的缘起与流派作简单考察。

第一节 发展与当代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问题凸显出来，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日益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各类各派的发展理论大多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各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本国从不发达状态中摆脱出来，赶上发达国家或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英国社会学家布兰特曾综合各家之说，对“发展”作了如下定义：“发展是社会有意识地向科学化和成熟变化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既定的、估计可行的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从这样一个视角进行考察，战后发展理论大体上可分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和以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三大类发展观。研究这些不同特点的发展学说，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盛行于本世纪 50—6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走向崩溃，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产生。这些新独立的贫穷国家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后，面临着如何振兴本国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课题，产生了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如“赶超发展战略”、“起飞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按步就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战略理论的主旨是以追求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数量增长为核心，过分强调工业化，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

传统发展观的出现与当时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为主的早期发展经济学观点的流行有关。这个时期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有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论、罗宾逊增长模式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大推进理论及沃斯特·罗斯托、威廉·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这些理论虽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各自都不乏真知灼见，但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导致人们形成的是一种不正确的片面发展观。按照这些发展理论，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主要是“经济的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把馅饼做得大些”。只要经济的馅饼做大了，社会发展的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样，他们把发展的根本问题看成是尽可能提高 GNP 水平和人均 GNP 水平的问题，认为 GNP 及其增长率等等指标就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指标和尺度。

这种传统发展观得到了当时许多国际组织的支持。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中，规定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

是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最低为 6%；1969 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提出的皮尔逊报告及 1970 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廷伯根报告都体现了传统发展观的精神。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被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它存在一系列的弊病和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消除贫困，也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困。60 年代，确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单纯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了经济发展；就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也达到了国际发展机构所设定的 GNP 年增长 5% 的指标。但是，这并未改变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以巴西为例，巴西可谓是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典型。60—70 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相当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于工业 16 大行列。但到 80 年代，巴西由于忽视了分配公平等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成了一个高度畸形发展的国家：农民极度贫困，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1.3 亿人口中有 7000 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巴西发展靠外援起飞，到 80 年代，巴西欠外债已达 600 亿美元，每年要偿还一百几十亿美元，而巴西实际上根本无此偿还能力。60 年代巴西被西方国家视为“投资天堂”，此时则被视为“鬼域之地”。没有了外援的巴西经济瞬间垮台，人称巴西为一颗“经济彗星”。

其次，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社会发展的其他目标的实现。经济增长可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但人民幸福并不是由单一的物质消费水平来衡量的，因为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只是人民幸福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意味着社会贫富差别的缩小，也并不代表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相反，单纯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营养不良、失业和贫困的增加。据 1977 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在第三世界国家，有 2.5 亿人拥挤在破烂不堪的城镇里；有 3 亿人失业；5.5 亿人是文盲；7 亿人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状态；

12 亿人得不到清洁饮水和卫生条件；即使像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这样一些中东富油之国，人均 GNP 达 1 万美元以上，但其社会进步并不见根本好转，医疗卫生水平低，文盲人口多，社会分配差距大。

再次，传统发展观未考虑资源与环境问题。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造成资源与环境的大量浪费与破坏。占世界人口 6% 的美国，在其发展中消耗了地球上整个自然资源的 55%；就连瑞典这样仅 1000 万人口的小国，其电力消耗比 8—9 亿人口的印度还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使环境污染和其他社会问题加剧，最终危及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单纯经济增长引发的负面效应，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称之为“有增长无发展”、“恶的增长”，一些人甚至提出了经济增长早期阶段与社会发展的负相关理论。正是这种“恶的增长”和“增长与发展的负相关”的状况，促使人们最终纷纷放弃传统发展观，寻找新的发展战略。

二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

70 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放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战略，“基本需求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生态发展战略”等开始登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乃是“基本需求战略”。“基本需求战略”是 1976 年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衡量发展的主要指标应为五个方面：即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和就业情况。这种理论的提出，代表了发展观的转变，把发展的根本内涵从“经济增长第一”转到了人的全面发展方面。

发展观的转变意味着发展目标的转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

定、自主。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

我们特别要提到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 F·佩鲁的观点：1983 年，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发展观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代表社会的、政治的、科技的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人的全面的、综合的、协调的发展过程。这种新发展观的两层主要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一，强调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与传统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不同，新发展观强调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认为经济的增长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一种物质的条件和手段，人自身的发展才是最终目标。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人的发展实际上包括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二，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综合发展观指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保证，经济与社会二者应保持均衡发展。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所有的人民能够更好地生活提供日益增多的机会，其实质是对收入和财富实行更平等的分配，以促进社会公正和生产效率，提高实际就业水平，更大程度地保证收入并扩大和改善教育、卫生、营养、住房及社会福利设施，以及环境保护。因此，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

变迁必须同迅速的经济增长并驾齐驱，而且应切实减少现存的地
区、部门及社会内部不平等。这些目标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最
终结果，因而它们应被看作是同一动态过程的合成体。”这样，
就把发展本质上看作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各要素综合的、整体的发
展过程。

三 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反思后提出来的，是以人
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
害”^①。“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通过健康而富有生产
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
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②。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
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强调人类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
利应当是坚持与自然和谐统一，而不能凭借手中的技术和投资，
竭泽而渔，以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追求一时的发展。
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该
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发展机会与后代人的发展机会相平等，
不允许当代人一味地、片面地、自私地为了追求今世发展而毫不
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发展与消费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观在 70 年代就已经提出，但当时人们不够重视，
“基本需求战略”成为当时各发展中国家首选的发展战略。到 80
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思想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I·迈尔斯在
《人类发展的社会指标》一书中指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应当是
有利于所有人的发展。它应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社会所有成员
都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可能性，一些人的发展不应以压制另一些

① 《我们的共同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第 36 页。

② 《里约宣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第 296 页。

人的发展为前提；第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应当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或妨碍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发展，要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权利；第三，现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代价，同时还要尊重前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成就和价值；第四，关心后代人的发展也不应当意味着对现代人的剥夺，以遥远未来的名义来压制现代人也是不公正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迈尔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鲜明性，也反映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1992年巴西国际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观终于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在世界首脑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下来。

可持续发展观不能等同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观。实质上，可持续发展战略既不是简单地重视环境，也不是单纯地注重人的思想的扩张，而是一种崭新的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的核心是重视人类的整体利益，或者说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观。对环境与资源的重视，对后代人发展权益的重视，对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权的充分尊重，都可以说是这一核心思想的逻辑展开。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社会发展都是在一定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的。传统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三种相应的发展战略，是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今天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构建符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发展战略。2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新构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继承

毛泽东的发展思想，并对世界各国不同发展战略进行科学的辩证综合的产物。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的辩证发展，对于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发展

我们所谓的当代中国，乃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属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行列。建国伊始，发展问题历史地提到了新中国的领导者面前。

一 当代中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大高潮

了解国情，是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决定或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总和。国情一般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科教文化与对外关系诸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其相互关系。

可见，国情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由相互联系的各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情同时又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国情是不同的，因而国情是历史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毛泽东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能不考察发展着的中国国情。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是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水平极其低下。以 1949 年为例，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557 亿元，国民收入为 358 亿元，5 亿多人口，人均仅为 66 元。具体地说，当时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 17%，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低得可怜：钢

产量为 15.8 万吨，最高年产量是 1943 年，也才 92 万吨；发电量 43 亿度，最高年发电量是 1941 年，也仅 60 亿度；原煤 3200 万吨，最高年产量是 1942 年，亦仅 6188 万吨；原油 12 万吨，最高年产量是 1943 年，为 32 万吨。以上产品分别只是美国同年钢、电、煤、油产量的 2%、3%、10% 和 0.15%。9.1% 的企业为工场手工业，社会化程度很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占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 90%，到 1949 年时仍为 83%；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新中国建立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历史地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考虑的头等重大的问题。

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同于他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发展的起点、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途径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从发展起点看，新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从发展过程看，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之前，经历了一个由旧到新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这个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虽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但是，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过程，亦即同时是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取缔投机资本，平抑市场物价，促进生产发展，到 1950 年，物价趋于平稳，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到 1952 年，国民经济即得到基本恢复和发展。1952 年底，我国钢产量达 135 万吨，为 1949 年的 8.5 倍；原煤 6649 万吨，为 1949 年的 2.1 倍；发电量 73 亿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89 页。

为 1949 年的 1.68 倍。和 1949 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45%，农业总产值增加 53.4%；其中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 41.1%，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又占到了全部工业产值的 64.2%。我们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并有较大发展，这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料，比 1917 年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要好得多。

有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的基础，进入 1953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揭开崭新一页的一年。是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编制和实施。这一计划的实施，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步骤，它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据统计，1953 年到 1957 年，全国社会总产值达 1606 亿，比 1952 年增长 70.9%；其中，农业产值 537 亿，增长 24.8%，所占比重下降为 33.4%；工业产值 704 亿元，增长 1 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 43.8%；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9.6%。这说明，“一五”期间，在工农业总产值都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状况。

“一五”时期，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令人欣喜：到 1957 年，钢产量达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66%；煤 1.31 亿吨，比 1952 年增长 98%；发电量 193 亿度，增长 154%；粮食增至 1950.5 亿千克，增长 19%；棉花总产达 164 万吨，增长 26%，都创了历史最高记录。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81 年 9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邓小平也曾指出：这 10 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

但成绩是主要的”^①。虽然，前述“一五”的发展已涵盖到了1957年，但我们这里仍将1956—1966年谓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一期间，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部署下，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继续朝前发展：到1965年，全国钢产量增加到1223万吨；煤增加到2.32亿吨；发电量增加到676亿度；原油增加到1131万吨；粮食产量增加到2140亿千克（1966年）；教育文化方面，新建扩建高等学校32所，1965年时，在校生徒达67.4万人，10年毕业学生达到130.8万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科技获得大发展：在陆相地层找到了丰富石油资源，打破了“中国贫油论”；1964年首次爆炸了原子弹，打破了美苏核垄断；第一次在世界上人工合成了蛋白质——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等等。这10年的成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二大高潮。

1976年10月，10年“文革”结束。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地确立起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五五”、“六五”、“七五”、“八五”四个五年计划。“五五”计划时期主要是拨乱反正，消除10年“文革”造成的消极影响；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